

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深化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认识

陈雨露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前不久，《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其中的多篇著作，都对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提出的重要新命题，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进一步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深化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认识，是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前提，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立足国民经济循环，深刻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没有需求，供给就无法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总供给体现一定时期市场为全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量，总需求体现同一时期市场对全社会总产品和服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国民经济循环是否畅通，可以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是否平衡来判断。一般说来，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会表现为“过剩”状态，产品滞销，价格总水平下降；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会表现为“短缺”状态，产品供给不足，价格总水平上升；当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则表现为整体平稳的状态。

供求关系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平衡不仅是由供求关系本身决定的，同时也是由隐藏在总供给和总需求背后的经济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环节决定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在供求关系中，生产处于供给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处于基础性地位。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既是上一个循环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循环的起点，因此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具有独特地位。在供求关系中，消费处于需求端，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活消费是最终消费，构成真正的、直接的消费需求；生产消费通常表现为投资，投资会增加购买，因而会增加总需求。但同时，投资的目的是生产，因而从未来来看其实质是增加总供给。因此，对于投资增加总需求的作用要作具体分析。分配环节和流通环节不直接形成供求关系，但却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离开收入分配，消费也就无从谈起；离开流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也就无法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

仅需要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更需要推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作用、有机衔接。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如果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累，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

对于宏观经济治理，如果仅仅从供求关系看，一般会认为供给侧管理是管长期的，需求侧管理是管短期的，两侧难以同时发力，也就无法统筹。这种认识抽象掉了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作用、有机衔接的内在规律，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个完整、连续的整体，是一个相互联系、运动不息的复杂系统。只要社会再生产活动不停止，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就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统筹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然要求。这也是党中央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理论依据所在。我国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能够有效提升供给能力，进而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并创造就业和提高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同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将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中，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二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正是为了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刻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发展总是力求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宏观经济目标。同时需要看到，仅仅是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并不必然代表增长，更不必然代表高质量发展。深刻把握“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能抽象停留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上，必须落实到新时代以来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来。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表明，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对此，我们要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辩证关系来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指出：“从

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经济循环畅通的深层关系上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这表明，只有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才能更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因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刻解释了国民经济的特征和优势在于内需为主导、内需可循环，为我们不断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而是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从国民经济循环内在要求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生产领域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在分配领域要求优化分配结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流通领域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在消费领域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不断夯实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基础。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深刻把握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规律，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经济总量和质量不断跃上新台阶。2013—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6.9万亿元增长到134.9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新动能日益成长壮大。同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产能能耗最大、发展速度全球最快。这充分证明“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当前，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个别国家对我国遏制打压势头不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构，对国际经济循环造成阻碍；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完善，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民生领域存在短板；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有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还有不少。分析原因，从需求侧看，以消费不振为主要特点的国内需求不足，致使国内大循环动力不充沛、循环不畅通；再加上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对关系的

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将增加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从供给侧看，我国新动能转换尚未完成，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并赋能传统产业均需假以时日。特别是上述过程要求优化资源配置，而在此之前供需不协调的问题将在短期内出现。从大的方面看，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整个社会再生产及其经济循环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此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矛盾的深刻把握。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要坚持以经济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在需求侧，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发挥好消费和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引擎作用。收入分配影响最终消费，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进一步补齐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提升消费意愿；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在提升传统消费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投资属于生产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具有双重作用，需要科学引导和把握。一方面，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超长期贷款配套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利润率回升，稳定民间投资的预期。投资在长期内是增加总供给，因此要根据国家规划、宏观政策组合，积极引导社会投资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起新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房地产业具有增加消费和拉动投资的双重作用，在扩大总需求中具有特殊地位，要在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中释放需求潜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离不开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要加快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在供给侧，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二是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化发展，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是培育生物医药、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依托强大制造能力与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四是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湖湘大地自古文脉绵延，孕育了湘绣、滩头年画、土家织锦、铜官窑陶瓷等众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艺术凝结着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化转型赋能非遗的创新路径

一段时间以来，在现代工业技术快速发展和全球信息化浪潮席卷之下，非遗面临传承匮乏、展示手段单一、资源整合滞后等问题。然而，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非遗构建起超越时空和形态限制的信息传递方式。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不仅拓宽了非遗的传播渠道，还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在数字化的语境中，非遗能够通过虚拟展示和互动体验，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比如，通过打造“数字绣娘”虚拟IP，将千年的传统针法带入元宇宙空间，展现了独特的湖湘美学；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运用全息投影和5G直播技术，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虚实结合的沉浸式秀——《新刘海砍樵》，成功吸引了百万年轻用户在线互动……这种沉浸式体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人们更直观地理解、感受各类非遗瑰宝。

湖湘非遗数字化传承的实践，包含非遗信息采集、数字存储、虚拟展示、互动体验与数字文创等各环节之间相对独立又互为一体，共同为非遗保护提供“立体式”支撑。信息采集与数字存储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完整保存文化基因，构建数字资源库，为非遗的活态传承奠定基础。包括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在内，多所省内高校研究团队通过近景摄影测量，采集了湖湘木雕、陶瓷、湘绣、织锦等非遗实物的高精度数据，完善了非遗采集数据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整理和标准化管理体系。同时，基于云存储以及分布式数据库等技术，实现数字化非遗资料的跨地域共享和便捷调取，为开展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提供了稳定的数字资源载体。

数字化转型赋能非遗的具体实践

VR与AR技术的日渐成熟，让非遗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桃源刺绣VR数字化设计项目”便是利用VR技术，通过创建虚拟场景与交互游戏，还原传统刺绣工艺的创作过程。观众不仅可以在虚拟展厅进行360度全方位刺绣欣赏，还可以通过虚拟交互的方式，了解非遗传统工艺的制作流程及传统审美。该项目也包含AR技术，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扫描非遗元素，自动触发AR技术展示出其相关信息，如相关解说词、工艺流程的动画演示等，更准确有效地获得用户所关注的传统文化内容。此外，还有“神秘湘西”非遗VR剧场项目，通过VR技术实现观众穿戴虚拟苗族银饰，体验苗族传统舞蹈；在张家界大峡谷的AR导览中，游客通过扫描实景，就能触发土家织锦AR制作演示。这些项目利用VR与AR技术，极大提升了游客参与度，进一步拓宽了非遗的数字化表达方式，实现“破圈”传播。

开发数字文创产品。数字文创产品是通过文化转译、设计再生的手段，在深入挖掘非遗内涵的基础上将传统元素巧妙融入现代产品设计，打造出有特色、有品位、有价值的文创产品。在湖南师范大学湘绣研发中心，团队将传统湘绣图案和技法进行数字化处理，开发了多种数字化湘绣产品，保留传统湘绣精美工艺的同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使用需求。

非遗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困难和着力点

目前，湖湘非遗数字化传承已经构建起了数据采集、存储、展示、互动各环节彼此耦合的完整体系，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在机制、标准、技术层面等不断改进完善，逐步构建起完善非遗数字化传承运行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健全技术标准体系，统一数据采集、处理和展示规范，在确保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建设普惠性、共享性平台，推动非遗数字化为大众共创共享，使数字化手段真正服务于非遗传承的核心需求。另一方面完善数字版权保护机制，构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障相关从业者、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未来的数字传承平台建设，需要更加注重用户交互性。着力构建“内容定制、互动分享、智能推荐”的用户交互平台，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非遗资源的智能分类与传播。例如，“非遗虚拟博物馆”在传统线下展览形式的基础上，优化展览内容及多媒体展示技术，通过互动体验、虚拟讲解、在线研讨等形式，让公众深入了解传统工艺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数字文创产品研发，更应注重使用场景和传统文化的契合，将传统非遗中的文化元素变为符合当代审美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让传统文化从“陈列馆”走向“使用场”。同时加强跨界协作，实现非遗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市场转化。在文旅、教育、电商等多领域打造丰富应用场景，将数字化非遗植入景区体验、在线课程和文创电商等消费环节。借助数字营销工具及网络新媒体平台，增加非遗产品市场知名度的同时增强消费者的参与度，从而实现文化、科技与经济效益的共赢。在这种模式下，构建出“技术驱动—内容创新—市场盈利—传承反馈”的完整体系，促进传统文化价值与经济收益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还需深化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非遗保护的合理性研究，思考适合不同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传承模式，避免过度追求技术呈现而弱化文化内涵，推动形成良性的非遗数字化生态系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机关联、辩证统一。湖湘非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研究，深入挖掘背后的歷史脉络、文化寓意，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注入持久而深远的贡献。

（《湖南日报》）

深化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

伍俊晖

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校企协同育人的中坚力量。产教融合型企业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协同能力，有利于将产业需求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职业院校专业围绕产业动态调整。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建有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18个，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35个，校企共建产业学院184个、技术创新平台462个，建设了一批产教融合实训中心。产教融合型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实践，通过共拟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教学资源、共育师资队伍、共建科教平台等形式，推动了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人才培养向更高质量转变。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先行者。产教融合型企业拥有较高的技术资源共享能力，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从2019年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方案（试行）》，到2023年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有关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组合式激励政策措施持续完善，符合各地实际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工作有序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规模、质量蓬勃发展。尤其在今年初，《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印发，这一系统性政策供给，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明确了发展

路径，增强了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发展动力。校企协同，培养大批用得上、离不开的高技能人才，已成为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硕果。

产教融合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湖南作为制造业大省，截至2024年末，“四上”企业数量已突破6万家，但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不到600家，企业育人主体责任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联动规划还不紧密，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建设和发展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主要原因还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政策驱动不足，校企协同育人资源利用不充分，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因此，要切实推进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以政策体系为引领，信息平台为支撑，评价机制为保障，共同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实践，通过共拟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教学资源、共育师资队伍、共建科教平台等形式，推动了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人才培养向更高质量转变。

优化产教融合型企业政策体系。地方政府作为政策调控者，要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发展与产教融合发展政策系统同步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紧紧围绕现代产业体系新格局，基于各自发展实际，细化产教融合型企业影响与核心竞争力，发挥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示范引领作用，以点上突破辐射带动产教融合新格局面上创新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结合，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多元化、可持续性发展，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

与、学校主体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信息平台。创新协同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发展综合性工程，汇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方合力，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搭建产教融合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以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为根本，汇集人才培养、资源开发、科研项目、技术服务、就业创业等信息，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科研项目研制，从成果转化到创业孵化，不断激发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以此增强企业联合培养职业教育人才的社会责任感，打造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校企协同育人共同体。

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评价机制。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全过程管理制度，制定符合省、市、县（区）三级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考核办法，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信息公开与反馈机制，鼓励产教融合型企业积极总结在培育、建设、推广等各阶段的经验。同时，树立产教融合典型，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发挥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示范引领作用，以点上突破辐射带动产教融合新格局面上创新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结合，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多元化、可持续性发展，形成政府引导、行业指导、企业参

（《湖南日报》）

湖湘非遗传承的数字化创新探索

王巍